

1949 年前後來臺的上海商人

謝國興*

摘要

1949 年前後因應中共即將全面控制中國大陸的形勢，許多上海商人帶著資金、技術、設備、人員與現代經營管理觀念移居香港與臺灣，中共政權指責此為遷廠逃資之行為。臺灣的上海商人在 1970 年代以前是臺灣產業界（尤其是輕工業重心的紡織業）的一大勢力，對臺灣自 1960 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提供重大貢獻。隨著時代變化，臺灣工商業界的外省商幫勢力有所衰頹，但上海傳統商人延續下來的一些企業集團目前仍在臺灣傳統與新興科技業佔有重要地位。1990 年代政府開放大陸投資之後，上海商人以臺商角色重返大陸，近十年來由於政府執行戒急用忍政策，上海商人與其他臺商相同，再一次以經濟與產業存續為考量，對抗執政當局的政治與意識型態障礙。今日臺商之西進，對比當年上海商人的浮海東來，歷史何其吊詭。

關鍵詞：上海商人、遷廠逃資、戒急用忍、臺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 一、前言
 - 二、避秦來臺
 - 三、在臺上海商人的籍貫、經營行業與人力素質
 - 四、1950年代上海商人在臺灣產業界的地位
 - 五、在臺上海商人與企業的起落
 - 六、投資中國
 - 七、結語
-

一、前言

上海是中國自清末以後因開埠而形成的最大工商業都市，匯集全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先進企業、產品與工商經營人才。在1949年之前，上海的工商繁榮是在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發展起來的。1948年，國共內戰由北而南，眼看共軍與共黨勢力即將席捲全國，上海的大多數工商業者（資本家）當時對中共瞭解不多，但對於社會主義主張消滅私有財產，卻不能沒有疑慮。一方面，國民黨勸說上海的資本家跟隨政府撤退，向廣州遷廠，或到臺灣去；另一方面，共產黨也透過各種管道（包括地下黨員）宣傳，希望留住資本家的資金、人才、設備。多數業者即使想要遷廠也非易事，不過最後仍有不少事業有成的工商業者選擇離開上海，有些人遷到了香港，有的移往臺灣，也有少數到了南洋、巴西等地。這些選擇離開的人，帶走了部分資金、人才及設備。中共政權成立後，譴責資本家的這種行為是「遷廠逃資」。

在這裡，上海商人的定義是：1949年以前在滬、寧、杭三角所構成的地區內活動，並以上海為商貿業務往來核心之工商業者。香港大學黃紹倫教授在1988年出版了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 in Hong Kong*，⁽¹⁾ 是

(1) Siu-lum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 in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第一本關於 1949 年後「遷廠逃資」的上海商人後續發展情況的研究成果，主要探討對象是遷移香港的上海紡織工商業者。至於上海商人到了臺灣之後的變化，過去似未見較系統之論述，本文之論述或可稍稍補充其中的不足。上海商人到了臺灣之後，重新建廠、開舖、經營，參與了臺灣戰後的產業復興，以及以紡織工業為起點的臺灣經濟起飛歷程，對於締造臺灣著名的經濟奇蹟，曾發揮相當作用。1980 年代之後，臺灣的傳統製造業生產成本漸高，為了維持企業與產品的競爭力，剛開始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大陸，成為臺灣傳統產業延續經營與尋求利潤的新基地，尤其是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認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大方向不變之後，臺灣商人（包括當年自大陸來臺的上海商人，後來也成了臺商）前往中國大陸設廠投資的絡繹不絕，成為大陸外資的主力之一。

從過去對上海商人離滬的道德指責，到後來為了發展市場經濟，中國各省區動員關係，張臂歡迎倖存於海外的這些「遷廠逃資」者重回大陸投資，歷史的弔詭是如何形成的？當代中國的這一條曲路呈現何種時代意義？

二、避秦來臺

1948 年底到 1949 年初，共軍即將渡過長江，上海地區人心惶惶。大資本家、尤其是紡織業者，紛紛做遷移的打算。一部分大型業者遷往香港開辦新廠，如王統元的香港紡織、唐星海的南海紡織、陳延驊的南豐紡織、查濟民的中國染廠等，榮家企業（上海最大的紡織集團）也陸續在香港開辦緯綸、南洋、大元、九龍等紗廠，奠定香港在 1960 年代前後製造業繁榮的基礎。⁽²⁾

遷移臺灣的上海工商業者中，有大型企業如大隆機器廠的嚴慶齡、榮家企業系統申新紡織（一廠）的王雲程、生產洋房牌內衣的遠東織造廠（徐有庠）、馥記營造的陶桂林等，也有中小型的業者如張敏鈺、焦廷標、翁明昌、鮑朝樞等。遷臺的上海企業與商人中，除了一般民間企業之外，尚有一批原在政府機構任職的專業技術官僚，或隨國民黨政府公營企業遷臺，或來臺後轉而投入民間工商業，

University Press, 1988).

(2) 馮邦彥，《香港華資財團》（香港：三聯書店，2002），頁 139-145；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下冊，頁 671。

對後來臺灣經濟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這是移民香港的各省籍商人中少有的現象。1951年，臺灣當局派雷震與洪蘭友赴香港勸說遷港的原大陸工商業者來臺灣投資設廠，並代辦入境手續；1951年10月之後即陸續有香港工商界人士申請來臺設廠，形成另一波外移的大陸工商界人士轉進臺灣設分廠或遷廠的風潮。⁽³⁾ 據統計，自1951年起至1956年10月止，香港及東南亞華僑因此政策來臺設廠生產的共有91家，包括原上海商人陳能才的「中華毛紡織廠」、周兆棠、童省予的「大華綢廠」等。⁽⁴⁾

大隆機器廠為嚴裕棠於1902年在上海創辦，起初從事修理黃浦江上的外國輪船，1920年代後期大隆機器廠開始生產織布機與紡紗設備，同時購買蘇州蘇綸紗廠經營棉紡織業，即所謂「棉鐵聯營」；1930年代中期起，嚴裕棠的四子嚴慶齡成為大隆機器廠的主持者。⁽⁵⁾ 嚴慶齡1931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繼赴德國深造，獲德國國家工程師學位，返國後主持嚴家機器事業。1948年眼見大陸局勢丕變，嚴慶齡、吳舜文夫婦來臺灣考察投資設廠的可能，最後在新竹縣竹北買好建廠土地，回上海後委託曾任馥記營造廠經理的周敬熙來臺灣負責建廠，另一方面從上海運來泰利機器廠（嚴家另一機器廠）生產的1萬枚紗錠，⁽⁶⁾ 1949年在臺灣成立臺元紡織，1951年開始生產。

1948年底，嚴裕棠家族在上海及蘇州的產業包括大隆、泰利兩家機器廠，蘇綸、仁德兩家大型紗廠（有6萬多錠，2,000多臺織布機），另有元生、泰昌、泰新3家中小型紗廠，以及與人合夥投資經營的蘇州紗廠。⁽⁷⁾ 嚴慶齡原本計畫將大隆機器廠的大部分設備都拆遷運走，但因當時中共地下黨運動工廠員工反對拆遷，最後只拆走了工作母機67部。⁽⁸⁾ 1949年春，嚴裕棠帶著排行二、三、四的3個兒子嚴慶瑞、嚴慶祺、嚴慶齡及女兒嚴慶怡移居香港，大兒子嚴慶祥及排行五、六的

(3) 參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49-04-07-003-016。

(4) 《聯合報》，1956年10月25日，第6版。

(5)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大隆機器廠的產生、發展和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版），頁26-39。

(6) 溫曼英，《吳舜文傳》（臺北：天下文化，1993），頁103、139。

(7)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大隆機器廠的產生、發展和改造》，頁84。

(8) 同上註，頁86。

嚴慶禧、嚴慶祿則留守上海；⁽⁹⁾不久嚴裕棠跟著二兒子嚴慶瑞移居巴西，三子嚴慶祺在香港辦怡生紗廠，四子嚴慶齡則到臺灣創辦裕隆機器廠（裕隆係取嚴裕棠的「裕」與大隆機器廠的「隆」作為公司名稱）。

嚴家遷移出上海的機器設備雖然十分有限，但因有1萬枚紗錠，後來成為嚴家在臺灣重建產業的基礎。

遠東織造廠的徐有庠（1911-2000）原籍江蘇海門，在啓東唸完初中，入棉花雜糧商號當了3年學徒，1930年代轉往上海學生意，26歲開始與人合夥開設商行，1943年轉入生產事業，跟李積慶（江蘇鎮江人）合夥開了一家小型的鴻豐棉織廠，生產針織汗衫與衛生絨布；抗戰勝利後，徐有庠成立遠東織造廠，生產洋房牌內衣（李積慶後來經營慶祥棉織廠，1949年亦遷來臺灣），正式加入紡織工業行列，並因紡織界朋友陸菊森與吳中一引介，認識戰後到上海市政府任職的王新衡。⁽¹⁰⁾

王新衡（1908-1987），浙江慈谿人，父親王德庠在上海任律師，王新衡在上海成長，上海大學肄業，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與蔣經國同學），1930年回國，進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後為軍統局（特務機構）重要幹部，長期負責與俄共及中共鬥爭相關工作，1945年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兼調查處長，1947年當選立法委員。⁽¹¹⁾徐有庠因王新衡而增加對共產黨的認識，遂於1949年將自己在上海的產業結束，變換值錢物資遷移臺灣，包括5,000件棉紗（200萬磅）、5萬疋棉布、8萬打汗衫和衛生衣，這些物資在當時經濟匱乏的臺灣非常值錢。⁽¹²⁾徐有庠除了在臺北恢復遠東織造廠並新設紡紗廠（後來合併為遠東紡織公司）外，鑒於臺灣即將展開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1953），遂聯合上海商銀創辦人陳光甫在1951年申請興建水泥廠。當時臺灣僅有接收日治時期設備改組的「臺灣水泥」一家舊廠，後來核准新設嘉新水泥（上海商人張敏鈺投資），但產量尚不敷全省需求，惟主管部門認為第三家水泥廠設立之後產量將過剩，堅持不准增設，一拖5

(9) 宋路霞，《上海灘豪門望族》（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頁289。

(10) 徐有庠，《走過八十歲月》（臺北：徐旭東出版發行，1994），頁1-89。

(11) 熊鈍生主編，《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臺北：中華書局，1978），第三冊，頁1410；國史館編，〈王新衡先生事略〉，收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1988），第1輯，頁80-81。

(12) 徐有庠，《走過八十歲月》，頁95。

年，陳光甫不耐久等，將其資金（1,000 萬元）投資新成立的中華開發信託公司。徐有庠轉請與蔣經國交情甚佳的舊識王新衡（擔任立法委員）協助，1957 年申請獲准，王新衡任董事長，「亞洲水泥公司」正式成立，資本額 5,500 萬元，並獲美國開發貸款基金 300 萬美元。⁽¹³⁾ 亞泥一開始就有了良好基礎，加上臺灣水泥業早期屬於寡占性質，徐有庠亦善於經營，一直穩健獲利。遠東紡織與亞洲水泥是遠東集團早期的兩支重要支柱，徐有庠以此為基礎建構後來多角經營的臺灣遠東企業集團。

張敏鈺(1913 生)，浙江鎮海縣人，中學畢業後到上海習商，創辦悅新染織廠；1948 年底張敏鈺將悅新染織廠主要設備拆解，裝上了太平輪運往臺灣，不幸因太平輪在舟山群島附近海域發生海難沈沒，悅新設備隨太平輪沈入海底，此一海難事件使張敏鈺「在上海的辛苦耕耘，竟在瞬間，喪失逾半」，因此一度不想離開上海。⁽¹⁴⁾ 不過三個月後張敏鈺還是毅然搭機飛來臺北，隨身帶來的資產包括 3,000 多疋布，1,000 兩黃金，變賣之後在臺北縣三重設立臺灣悅新染織廠。⁽¹⁵⁾ 張敏鈺因經營染織業而代表業界參與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¹⁶⁾（先後擔任理事、常務理事），因此機緣得以認識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束雲章（亦為立法委員），並刻意與之交好。⁽¹⁷⁾ 1954 年 3 月，束雲章與同樣來自上海的幾位商人張敏鈺、林炳軒、翁明昌等申請設立紡織公司未果，改為組成嘉和麵粉公司與嘉新水泥公司。⁽¹⁸⁾ 爲了籌設嘉新水泥，張敏鈺特別央請束雲章任董事長，以借重其地位與影響力，束雲章在嘉泥只有 4 萬元股份（實際上爲其他股東墊借），1958 年嘉泥順利開工生產，束雲章辭去董事長，張敏鈺繼任。⁽¹⁹⁾ 1960 年，張敏鈺、翁明昌、李文輝等人

(13) 遠東紡織關係企業遷臺 30 週年紀念特刊編印小組編，《遠東紡織關係企業遷臺 30 週年紀念》（臺北：遠東紡織關係企業遷臺 30 週年紀念特刊編印小組，1979），頁 80；徐有庠，《走過八十歲月》，頁 190-191。

(14) 張敏鈺，《平凡中創新機》（臺北：卓越出版社，1992），頁 128-129。

(15) 同上註，頁 129、150。

(16)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成立於 1952 年 2 月，立法委員束雲章為首任理事長，成員為當時臺灣工商界（包括公營事業）主要領導人物所組成，早期大部分理監事為外省籍人士。參見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工商協進二十年》（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1974），頁 403。

(17) 張敏鈺，《平凡中創新機》，頁 167。

(18) 朱沛蓮編，《束雲章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66。

(19) 同上註，頁 167、239。

合夥組設益新紡織公司（張敏鈺任董事長），⁽²⁰⁾張敏鈺得以從過去的小規模染織廠跨足較上游的紡紗業務。

紡紗廠與水泥廠是 1950 年代臺灣獲利最好的行業，徐有庠與張敏鈺這兩位上海商人是善於運用政商關係的典型。

1949 年以前，上海最大的紡織業者是榮氏兄弟（榮宗敬、榮德生）家族經營的申新系統紡織廠（名稱包括申新、鴻豐等），根據 1947 年的統計，榮家企業集團的紗錠數佔全國總數的 15%，⁽²¹⁾在民營企業中的規模為全國最大。1947 年之後，榮家先後在香港、泰國設廠，1948 年，申新一廠與申新六廠共拆了 15,000 餘枚紗錠及 400 臺織布機運到臺灣，建立臺灣申一紡織廠，主持人是榮宗敬的女婿王雲程，王雲程另外將申新一廠在國外訂購的部分紗錠運往香港南洋紡織（榮宗敬的三子榮鴻慶 1947 年在香港創設，王雲程為常務董事），擴充其規模。⁽²²⁾

榮德生、榮宗敬兄弟為無錫榮家投身工商經營之族親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榮宗敬（1873-1938）居長，娶三妻，傳三子：溥仁（字鴻元，1906-1990）、輔仁（字鴻三，1906-1983）、綱仁（字鴻慶，1923-），三兄弟均以字行，宗敬另有 4 個女兒；榮德生（1875-1952）有二妻，生七子：偉仁（字鴻增，1906-1939）、爾仁（字爾根，1908-1994）、伊仁（字一心，1912-1948）、毅仁（字繼增，1916-2005）、研仁（字研增，1919-）、紀仁（1923-1948）、鴻仁（1926-），另有 9 個女兒。⁽²³⁾1949 年前後榮宗敬的 3 個兒子離開上海出走，榮德生的 7 個兒子中，偉仁早故（子女則去香港），爾仁赴英國，伊仁於 1948 年 11 月赴香港時搭飛機失事身亡，研仁去泰國，紀仁 1948 年亡故，留在上海的只有毅仁、鴻仁兄弟兩人（鴻仁 1978 年赴澳大利亞定居）。據估計，1949 年 5 月中共接管上海時，申新系統各紗廠外移的資金、設備、物料等，價值超過 1,000 萬美元。⁽²⁴⁾

榮家企業除了遷不走的廠房及大部分設備未能遷移外，資金、成員可以說走了十之七八，其中多數到了香港，一部分來到臺灣，還有一些到了海外，因此若

(20) 中華徵信所，《臺灣區企業集團彙編》（臺北：中華徵信所，1971），1971 年版，06-3。

(21) 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238。

(22) 同上註，頁 258-259；宋路霞，《上海灘豪門望族》，頁 145。

(23) 榮敬本等編，《深談榮氏家族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頁 237-239。

(24) 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頁 259。1957 年公私合營清估產權，榮家仍保有約 6,000 萬人民幣的股權，謝國興，〈在社會主義改造的盡頭折返：定息問題及其餘波〉（未刊稿）。

要論遷廠逃資，可算是最嚴重的企業家族。在此背景下，榮德生與榮毅仁父子堅持不離開上海，榮德生甚至把一些已遷移到臺灣的設備追回，因此成了愛國資本家的典型，1952年三反五反及1957年反右運動時榮毅仁得到中共當局特別照顧，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長，都跟這個背景有密切關係。

火柴大王劉鴻生家族在1948年前後爲了「留一條後路」，派老四劉念智來臺北購置房地產，籌辦一家糖果工廠，在高雄辦中聯化工廠（劉念智後返回上海），另外將金銀財寶裝箱運來臺灣，交由老五劉念孝、老七劉念忠保管；劉鴻生主要產業之一的章華毛紡廠的部分資金則交總經理程年彭、襄理華爾康帶往香港與臺灣；劉鴻生一度到了香港，1949年底終究返回大陸，1956年10月1日病逝。⁽²⁵⁾

1952年中共針對工商界進行的三反、五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許多工商界人士開始面臨巨大衝擊，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更不在話下，許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甚至死於非命。相形之下，當年離開中國大陸的上海工商業者，無論他們是到香港或臺灣，一方面就個人來說，是慶幸自己「避禍海外」的正確抉擇，另一方面就整體來看，則因此延續了近代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部分元氣與命脈，五十年休養生息之後，意外的成爲重返大陸之根基。

三、在臺上海商人的籍貫、經營行業與人力素質

1955年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出版《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收錄當年臺灣各工商企業（包括公營事業）之董監事、總經理、經理、協理、襄理，或公司代表人（經營者）之基本資料（籍貫、年齡、學經歷、現職等），人數超過3,500人，可說涵蓋了當時絕大部分臺灣工商界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行號與人物。根據這一份人物誌資料，扣除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不列計，可統計當時（1950年代前期）臺灣工商界各行業主要人物的籍貫如表一所示。

就總人數來說，列名的臺灣籍工商業者（經理人、業主、代表人）總數是外省籍的兩倍半，主要原因是當時小型工廠與普通商號中有許多爲臺灣省籍本地人

(25) 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頁110-116；陳清宇、赫景秀，〈中華火柴大王劉鴻生〉，收於趙云聲主編，《中國大資本家傳》（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4）5，工商大王卷，頁180-182。

表一 臺灣工商界各行業主要人物籍貫統計(1955年) 單位：人

行 業	臺灣籍	外省籍	浙江 (1)	江蘇 (2)	上海 (3)	其他 省籍	(1)+(2)+(3) =(4)	(4)／外省籍
棉紡織	8	32	6	13	3	10	22	69%
毛紡織	0	19	7	8	1	3	16	84%
染織業	80	114	42	16	6	50	64	56%
一般製造業	455	199	39	32	14	104	95	48%
化工	171	84	26	25	9	24	60	71%
營建	73	39	11	12	7	9	30	77%
商行	794	165	45	32	12	76	89	54%
貿易	112	105	24	19	11	61	44	42%
文化業	91	54	10	9	6	29	25	66%
海運業	4	28	12	6	2	8	20	71%
汽車貨運	87	2	1	0	0	1	1	50%
保險金融	43	22	7	2	2	11	11	50%
礦業	97	9	1	0	1	7	2	22%
總計	2015	872	231	169	74	393	47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1955），數字係本文自行分類統計。

說 明：染織業包括印染、織布、針織、絲織業等；化工包括橡膠、肥皂、調味品、藥品製造等；營建包括營造、水電工程、建築設計；文化業包括電影、印刷、書局、廣告業；金融保險包括證券、合作社等。

所經營，而因為歷史與區域性因素，汽車貨運業（包括承攬業）與礦業（煤礦）也以臺灣籍人佔絕對優勢。紡織相關行業中的棉紡、毛紡屬於大型工業，外省籍經營者佔了絕對多數；染織業本省籍與外省籍經營者都不少，不過較大型染織工廠多屬外省籍人士所經營，因此表一染織業者中的外省籍人士仍多於臺灣本省籍。海運業在日治時期為日本商人壟斷，戰後殘存船隻被國民黨政府接收改組為省營臺灣航業公司，臺灣民間原少經營，1949年後上海不少民營輪船公司遷臺，民營航運遂出現外省籍（主要是上海來的業者）佔絕對優勢的局面。

在外省籍工商業者當中，江蘇、浙江、上海三地（廣義的上海人）的人士又

佔大部分比例。紡織相關行業中有接近百分之七十的業者來自江蘇、浙江，化工、營造、海運三種行業則超過百分之七十。依據工商業協進會 1955 年的這一份調查資料統計，當時含國營、省營之公司、金融機構等公營事業人員中，臺灣籍者 234 人，外省籍者 325 人，人數最多的是浙江、江蘇兩省，各有 73 人，其他人數較多的省份是廣東 35 人、福建 24 人、湖南 20 人、河北 18 人，本籍為上海市者只有 5 人，可見大多數上海人並不喜歡當公務員。

表二是本文所定義的「上海商人」（原籍不一定是上海）來臺灣後，在各行業中的人數分布。從中可以看出，上海商人 362 人中原籍上海（縣或市）者 70 人，比例不到 20%；江蘇籍者 98 人（來自無錫者最多，蘇州次之，鎮江又次之），佔 27%，原籍浙江者最多，共 159 人，佔總數的 44%；浙江籍中又以來自寧波地區

表二 1950 年代初臺灣工商界各行業中的「上海商人」統計 單位：人

行 業	合計	上海市	江蘇	浙江	(寧波)	其他省份
棉紡	26	3	13	5	(5)	5
毛紡	14	1	5	8	(7)	0
染織	54	6	10	30	(20)	8
製造	48	12	12	20	(13)	4
化工	42	6	20	10	(8)	6
營建	26	8	10	8	(3)	0
商行	48	9	10	27	(16)	2
貿易	48	10	9	23	(18)	6
文化	17	6	3	6	(2)	2
海運	9	1	2	6	(5)	0
自由業	19	5	1	11	(6)	2
保險金融	11	3	3	5	(3)	0
礦業	0	1	0	1	0	0
總計	362	70	98	159	(106)	3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數字係本文自行統計。

說 明：自由業主要為會計師與律師，少數為工商業團體選出的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

的佔多數（約 66%），⁽²⁶⁾ 寧波商人在上海的勢力可見一斑。其他各省人士到上海經商任職而可視為上海商人者，依表二統計，尚不及百分之十（9.6%）。

表三為上海商人遷移臺灣，重新起步創業的 1950 年這一年之年齡與學歷統計。從中可以看出，有年齡資料可稽的 337 人中，31 至 40 歲年富力強的人最多，共 156 人，佔 46%，41 至 50 歲者次之，約佔 28%，30 歲以下者佔 17%，50 歲以上的最少，佔 9%。就教育程度來看，在有資料的 329 人中，曾受大學以上教育者佔 49%，大約半數；在紡紗、營建、文化界有大學程度的比例則高達百分之六、

表三 1950 年代臺灣工商行業中上海商人的年齡與學歷統計 單位：人

行 業	30 歲 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 以上	大學 (含碩博士)	中學	小學
棉紡	5	8	10	2	14	9	1
毛紡	3	3	4	3	11	1	1
染織	9	27	18	0	13	38	2
製造	8	20	13	6	21	20	6
化工	7	16	13	5	20	18	1
營建	2	15	7	2	14	8	1
商行	10	25	10	3	13	22	10
貿易	11	20	13	4	23	20	3
文化	2	13	2	0	9	6	0
海運	0	5	2	2	7	1	0
自由業	2	7	8	2	14	1	0
保險金融	0	5	2	3	11	0	0
合計	57	156	94	30	160	144	2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數字係本文換算統計。

說 明：1. 部分人士之年齡與學歷不明，未列入統計。

2. 年齡指 1950 年時的年齡。

3. 私塾視同小學，專科或大學肄業等同大學。

4. 公營事業人員不列入統計。

(26) 寧波地區包括鄞縣、慈谿、奉化、鎮海、定海、象山、南田、餘姚、寧海等縣，參見金普森、孫魯根主編，《寧波幫大辭典》（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頁 2。

七十以上，海運、自由業、保險金融等行業之業主、主管與經理人，受大學教育之比例更高。如果再加上任職於公營事業的外省籍專業人士（大多數是大學學歷），我們可以肯定的說，1949年前後來臺的外省籍工商從業人員，是一批素質相當優秀的人力資源，無論在政府機構或民間公司，對後來臺灣工商經濟的發展，都發揮相當正面的作用。

四、1950年代上海商人在臺灣產業界的地位

(一) 紡紗業

紡織業是臺灣早期（1950年代）工業化的代表性產業，紡紗業又是其中的重點產業。在1952年以前，臺灣共有13家紗廠，其中有7家（華南、申一、中國紡建、臺北紡織、臺元、彰化、遠東）不是由上海遷廠就是由上海來的工商業者主導投資設立。1949年前後大陸業者最早在臺灣登記設立棉紡廠的是倪克定主持的華南紡織公司。華南紡織的前身為華南紗廠，1948年2月由上海、寧波裝運紗錠3,000枚來臺灣，在臺北縣三重購地設廠，但一部分紡機器在1949年1月27日托太平輪由上海運來臺灣時，因太平輪發生海難沈沒，華南紡織因此蒙受重大損失，影響後來的營運甚巨。⁽²⁷⁾彰化紗廠係馬俊德、吳升嵐、張敏之等原在上海辦九三實業公司（製造織布機梭子）之舊股東來臺後與臺灣彰化林榮春家族合辦，初期董事長由馬俊德擔任。⁽²⁸⁾

上述7家之外的另外6家紡織公司包括省營的臺灣工礦公司、山東籍商人宗仁卿兄弟經營的六和紡織、臺灣本籍商人經營的臺中紡織與新臺灣紡織，以及規模較大的大秦紡織與雍興實業。大秦紡織為石鳳翔遷移大陸部分資金設備來臺創辦，⁽²⁹⁾雍興實業臺灣紗廠為束雲章將中國銀行所屬雍興公司紗錠共2萬錠遷運來

(27) 〈美援運用委員會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31-02-047，「華南紡織公司」，頁166。

(28) 九三實業公司之資料見〈經濟部商業司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8-23-01-72-31-046。

(29) 芮廷玉，〈石鳳翔與西北紡織業〉，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工商史料》（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2，頁79。石鳳翔，湖北人，留日紡織專家，原在石家莊、西安辦紗廠，蔣中正次子蔣緯國岳父。

臺創設；⁽³⁰⁾大秦與雍興為 1950 年代初期臺灣地區規模最大的兩家紗廠。

臺灣因受戰爭破壞影響，1946 年全省紗錠不及 1 萬枚，如果扣除最早大陸廠商來臺裝設的 8,120 錠，1948 年只增加到 15,000 餘錠；1950 年之後因大陸遷臺各廠持續開工，加上 1952 年後新申請的幾個廠獲准設立，紗錠數突飛猛進，1950 年超過 5 萬錠，1955 年突破 20 萬錠，其中大陸遷臺各廠約佔七成，7 家與上海遷臺有關的紗廠合計錠數則佔三分之一強（參見表四）。論紗廠規模，1950 年代前期仍以大秦、雍興居首，不過，十年之後，上海商人經營的遠東（64,000 錠）、臺元（57,224 錠）兩家紗廠已躍居前兩名，大秦紡織因經營不善，負債過巨，被債權人臺灣銀行接收經營，改名復興紡織，最後被上海幫的中興紡織併購；公營的中國紡建臺灣廠（12,240 錠）、臺北紡織（13,200 錠）、雍興（21,560 錠）則原地踏步。⁽³¹⁾ 1967 年臺元紡織併購中國紡建公司，1972 年雍興、新臺灣被遠東紡織併購。

(二) 染織業

織布、染整、內衫（後發展為成衣業）也是早期棉紡織行業的重要部分，上海遷移臺灣的紗廠同時也兼營織布業務，另外有部分上海商人來臺灣初期，受資金限制，往往從規模較小的染織內衫工廠開始經營起。1950 年代初期在臺灣染織行業中資金、人員較多、設備較好、產能較高的公司，大多數是上海商人所經營（參見表五）。

另外，有一些上海商人在海外經營的公司係在 1952 年之後，因應臺灣政府號召華僑來臺投資設廠政策而自香港遷臺，或自海外來臺新設（不在表五所列公司內），較著名者包括新光標準內衣染織整理廠、鴻福紡織公司（1952，董事長劉慶一）、大華綢廠（1952，負責人童省予）等。⁽³²⁾ 新光標準內衣染織整理廠原為上海著名廠家，負責人傅良俊，1950 年 3 月傅良俊與公司主要人員先遷香港，⁽³³⁾ 1952 年來臺灣設廠，為當時臺灣規模最大襯衫與內衣工廠，遷臺後傅良俊所佔股份不多，主要股東包括上海商人張伯英、陸啓新、薛伯輝等。⁽³⁴⁾

(30) 朱佩蓮編，《東雲章先生年譜》，頁 120-122。

(31) 林邦充，〈臺灣棉紡織工業發展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20: 2（1969 年 6 月），頁 79。

(32)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49-04-07-003-016、49-04-07-003-019。

(33) 葛中平、董寧祥主編，《上海新光內衣染織廠五十五年》（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頁 46。

(34) 中華徵信所，《臺灣區企業集團彙編》，1971 年版，頁 X-6。

表四 1950年代前期臺灣棉紗廠開工紗錠數

單位：錠

公司名稱	設立	開工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備註
臺灣工礦公司臺北廠	1918年6月	1946年1月	4,324	5,868	6,268	6,652	10,076	10,076	10,076	10,076	10,076	10,076	日治時舊廠改營
臺灣工礦公司烏日廠	1942年3月	1945年4月	5,234	8,696	8,720	9,015	15,592	15,592	15,592	15,632	15,632	15,632	日治時舊廠改營，1955年改民營
華南紡織	1948年3月	1948年10月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5,120	5,120	5,230	上海遷廠
大秦紡織	1949年4月	1949年6月				5,000	13,992	29,400	29,400	29,652	29,652	30,660	石鳳翔西北系統
雍興實業	1949年3月	1950年1月					7,200	12,600	19,576	21,560	21,560	21,560	中國銀行公營系統
申一紡織	1949年1月	1950年4月					5,040	5,040	5,040	16,240	16,240	16,240	上海榮家系統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1949年8月	1951年1月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上海遷臺國營廠
臺北紡織	1950年6月	1951年3月						10,000	13,200	13,200	13,200	13,200	交通銀行投資
臺元紡織	1949年12月	1951年10月						10,368	10,368	10,368	10,368	16,416	上海麗慶船系統
六和紡織	1948年7月	1952年6月						3,2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山東幫
彰化紡織	1951年10月	1952年12月							6,484	6,484	6,484	10,800	上海商人與彰化林榮春合資
臺中紡織	1952年8月	1952年12月						6,000	6,000	10,000	10,000	10,600	臺中李卿雲
遠東紡織	1952年9月	1953年12月								10,000	10,000	12,000	遠東織造遷臺新設
新臺灣紡織	1952年12月	1953年2月									10,000	12,048	嘉義李占春
臺南紡織	1954年10月	1955年										10,000	臺南幫
裕豐紗廠	1955年9月	1956年											國民黨營事業，10,000錠
合計			9,548	14,564	18,108	23,787	50,020	98,536	139,384	168,940	178,940	205,070	

資料來源：吳銘琛，《臺灣棉紡織工業概況》（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10。

表五 1950年代初上海商人在臺灣經營的主要染織廠

公司名	負責人	業 務	設立年月	資本額(元)	職工數(人)
萬寶紡織廠	李廷棟	動力織布	1948年9月	150,000	439
悅新染織廠	張敏鈺	動力織布	1951年1月	300,000	128
申臺染織廠	翁明昌	動力織布	1951年4月	300,000	160
嘉豐紡織廠	陳任寰	動力織布	1950年1月	300,000	529
大東紡織染廠	洪嘉仁	動力織布	1951年10月	350,000	318
臺新布廠	朱繡山	動力織布	1949年9月	200,000	108
三興織造工廠	湯人俊	動力織布	1951年6月	200,000	45
太懋新記紗線布廠	錢志麟	動力織布	1951年10月	50,000	
新莊德記染織	朱澤民	動力織布	1951年7月	300,000	115
昶昆正記染織	邱錫霖	動力織布	1949年7月	200,000	115
遠東織造廠	徐有庠	內衫製造	1949年12月	280,000	393
慶祥棉織廠	李積慶	內衫製造	1948年	250,000	149
勝豐內衣織造廠	袁慎之	內衫製造	1949年	62,000	63
中興織造廠	鮑朝樞	內衫製造	1949年12月	150,000	75
寶豐內衣織造廠	馮天寶	內衫製造	1950年4月	20,000	43
中崙棉織廠*	范 震	內衫製造	1951年9月	1,100,000	128
五洲染織廠	孫蘭生	染整	1950年4月	600,000	143
中美染織廠	胡忠甫	染整	1949年5月	150,000	71
達豐絲織	周覺明	絲織	1951年	240,000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編，《臺灣的民營工業》（臺北：臺灣省政府建設廳，1952）；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編，《臺灣省民營工廠名冊》（臺北：臺灣省政府建設廳，1952），上冊。

說 明：*原為建國棉織廠，1951年7月為光明實業公司收購，改稱中崙棉織廠。

(三) 毛紡織業

臺灣的毛紡織業在戰前只有日本海軍所屬的南方纖維株式會社，1944年開始生產，1945年遭盟軍（美國）轟炸，廠房及設備損失慘重而停工。另有中央紡績會社從事更生紗紡織，也翻梳廢毛料，紡製粗毛紗供織毛毯；新竹紡績會社則從事苧麻纖維與毛料混紡。光復後，中央紡績會社標售民營，改稱美豐毛紡織染廠，南方纖維及新竹紡績的部分可用設備則遷移至彰化王田，成立王田毛紡廠（省營）。⁽³⁵⁾ 1949年前後，因上海各廠遷移設備來臺，臺灣的毛紡織業才開始有突破性發展。1950年代初期臺灣毛紡織業的紡錠變化如表六所示。

毛紡業者中，美豐毛紡係上海商人朱學仁（浙江鎮海人，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畢業，曾任上海美綸毛紡廠經理）購入經營；中本紡織最早設立於1944年10月，由時任交通銀行總經理的趙隸華領銜會同其他股東27人共同集資2,000萬元國幣在重慶設立，公司原稱「中本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以棉毛麻線之紡織加染及其原料物料之購銷進出口貿易及運輸等為業務」；⁽³⁶⁾ 1945年2月為與福民毛紡廠合作，公司股本增為4,000萬元，股東增為54人；⁽³⁷⁾ 1946年5月公司遷往上海，因通貨膨脹資本增為20億元，股東65人；⁽³⁸⁾ 1947年6月，股本再增為80億元，股東則增加至98人，公司名稱改為中本紡織股份有限公司。⁽³⁹⁾ 中本紡織係戰後新設，設備向美國新訂購，1948年後因局勢丕變，1949年部分機器設備改運臺灣，在臺北縣板橋設毛紡廠，王士強任總經理（王氏為浙江杭州人，曾任上海普益經緯公司經理20年），1952年改聘趙耀東（江蘇丹徒人，趙隸華之子）為總經理，登記資本為新臺幣80萬元，⁽⁴⁰⁾ 為當時臺灣最具規模之毛紡廠。

臺灣毛絨廠為上海章華毛紡廠的部分設備與資金遷臺後設立。章華毛紡的前身為清末設立的日暉織呢廠，上海著名企業家劉鴻生於1929年購入其設備，遷至

(35) 黃東之，〈臺灣之毛紡織工業〉，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工業論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卷二，頁123-124。

(36) 〈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8-23-01-72-07-235，「中本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頁89。

(37) 同上註，頁59-71。

(38) 同上註，頁36-47。

(39) 同上註，頁20-26。

(40)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編，《臺灣省民營工廠名冊》，上冊，頁1。

表六 1950年代初期臺灣毛紡織業設廠情況

廠名	1952年資本額	設立年月	紡錠別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備註		
王田毛紡廠 (省營)			紡毛紗走錠	350	350	350	350	700	700	700	700			
			紡毛紗環錠				210	210	210	210	210			
			小計	350	350	350	560	910	910	910	910			
美豐毛紡織廠	60,000元	1949年 1月	紡毛紗環錠	288	288	288	288	288	240	240	240	上海商人 朱學仁經營		
中本紡織公司 (交通銀行投 資)	800,000元	1949年	紡毛紗環錠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梳毛紗環錠			480	480	480	1,680	1,680	1,680			
			梳毛紗大環錠								400	400		
			梳毛紗翼錠								600	600		
			小計			720	1,200	2,400	3,400	3,400	3,400	3,400	代表人： 趙耀東	
臺灣毛絨廠 (上海草華毛 紡廠遷臺)	100,000元	1949年 10月	紡毛紗走錠								450			
			梳毛紗翼錠			624	624	624	624	624	624	624	代表人： 華爾康	
			梳毛紗帽錠									600	1,000	
			小計			624	624	624	1,224	2,074	2,074	2,074		
福華毛紡織染 廠	100,000元	1950年 3月	紡毛紗走錠				450	450	480	480	480			
			紡毛紗環錠										代表人： 黃均道	
			梳毛紗環錠				450	450	930	930	930	3,330		
			小計			450	450	960	1,560	1,560	1,560	1,860	代表人： 汪竹一	
勤益紡織廠	400,000元	1951年 7月	梳毛紗帽錠								代表人： 陳能才			
中華毛紡廠		1952年	梳毛紗環錠								代表人： 陳能才			
合計				350	638	1,982	3,122	4,432	7,864	9,464	13,494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編，《臺灣省民營工廠名冊》，上冊，頁12；黃東之，〈臺灣之毛紡織工業〉，頁126。

浦東設章華毛絨紡織廠，1930年開始生產，起初連年虧損，1933年改聘程年彭為經理，華爾康為襄理後，才轉虧為盈。⁽⁴¹⁾ 1949年3月至5月間，程年彭、華爾康兩人在劉鴻生同意下，將章華的部分外匯、呢絨87,000多碼、毛條約25,000磅，以及部分機器設備移運臺灣，據估計當時約值500萬美元（可能高估）。⁽⁴²⁾

福華毛紡織廠為浙江鄞縣王厚甫、黃均道所創設。王厚甫來臺前在上海經營華豐毛紡廠與大光明毛紡織染廠，⁽⁴³⁾ 黃均道與父親黃次倫原在南京、上海經營木材業，⁽⁴⁴⁾ 1949年來臺後向日本訂購機器設備重新設廠。⁽⁴⁵⁾

勤益紡織為顧毅近、顧興中父子（江蘇無錫人）於1949年將原在上海經營的勤奮毛紡織整染廠（1948年設立）設備拆遷來臺設立，汪竹一（江蘇灌雲人，來臺前為上海六區紡織工業公會秘書長）任總經理，1952年開工生產。⁽⁴⁶⁾

陳能才為浙江寧海人，原上海中華煤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華威銀行董事長，他於1952年由香港來臺創設中華毛紡廠（同時擔任中華民國僑資生產促進會理事長），1955年之後該廠所生產之毛紗開始外銷南韓、香港、東南亞等地。⁽⁴⁷⁾

1960年代中期是臺灣毛紡織業十分景氣的時期，毛紡廠新設十餘家，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利華羊毛工業公司（1964）與益華紡織工業公司。利華與益華均由應昌期擔任董事長，利華羊毛生產毛紡的原料毛條，主要股東包括顧儉德（江蘇太倉人，原任臺灣省物資局長）、顧興中（勤益紡織）、陶子厚（山東籍企業家）、陳能才（中華毛紡）、朱學仁（美豐毛紡）等人；⁽⁴⁸⁾ 益華紡織從事毛紡織染整及加工，主要股東包括中華開發信託公司、利華羊毛、王雲程（申一）、華爾康（臺灣毛紡）、顧興中（勤益）等，由上海來臺的紡織業者共同投資設立。⁽⁴⁹⁾ 應昌期為浙

(41)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劉鴻生企業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上冊，頁254-255。

(42)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劉鴻生企業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下冊，頁453-454。

(43)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49-03-04-004-336，「福華毛紡織廠申請結匯」，頁5。

(44)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頁265-266。

(45) 黃東之，《臺灣之紡織工業》（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6），頁12。

(46) 〈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8-23-0172-07082，「勤益毛紡織整染廠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49-03-04-004-344，「勤益紡織廠申請結匯」。

(47)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頁226；海外出版社編，《僑資工廠在自由中國》（臺北：海外出版社，1958），頁31。

(48) 中華徵信所，《臺灣區企業集團彙編》，1971年版，頁X-3。

(49) 同上註，頁X-4。

江慈谿縣人，幼年即赴滬入統原銀行當學徒，自修勤學，後考入福建省銀行就職，得嚴家淦賞識，1945年隨嚴氏赴臺灣銀行工作，累升至副總經理（代總經理），1960年代初辭卸臺銀職務，參與創立華夏海灣塑膠、利華羊毛、國泰化工（前身爲劉鴻生集團在臺灣高雄設立的中聯化工）、益華紡織、國際票券等公司，爲臺灣知名之企業家。⁽⁵⁰⁾

(四) 塑膠石化業

很多人知道王永慶經營的臺灣塑膠石化集團長期是臺灣最大的製造業集團，但很少人知道1954年臺灣塑膠公司成立的關鍵人物之一是上海商人趙廷箴。

趙廷箴（1915年生），江蘇吳縣人，上海大學畢業，原在南京、上海一帶從商，抗戰勝利後來臺，先任公職，後轉而從事營造業，因業務關係與從事木材行業的王永慶認識。⁽⁵¹⁾ 1950年代初，臺灣規劃利用美援外匯推動各項工業建設，構想之一是利用臺灣製碱業生產燒碱的大量副產品氫爲原料，製造塑膠原料PVC粉。負責規劃的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原先希望當時開設較具規模塑膠工廠的何義（永豐餘集團創始人）負責籌設公司，何義到國外考察之後，認爲臺灣市場太小，不願投下大資本建廠，恰好王永慶想辦工廠（第一目標是水泥廠），透過趙廷箴（與當時行政院秘書長陳慶瑜有親戚關係）牽線找上工業委員會，但辦不成水泥廠，糊里糊塗接手承辦塑膠原料廠，設立製造PVC粉的福懋塑膠公司（1957年改名爲臺灣塑膠），王永慶任董事長，趙廷箴任總經理，筆路藍縷，將當時堪稱全世界第一小、沒有人看好的塑膠原料公司支撐下來，後來發展爲全球數一數二的石化業者。⁽⁵²⁾ 趙廷箴後與王永慶經營理念不合，於1964年離開臺塑，與應昌期合作另創華夏塑膠公司。

(50) 國史館編，〈應昌期先生事略〉，收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2000），第23輯，頁698-700。

(51) 李鴻儒主編，《江蘇旅臺人士史料彙編》（臺北：復興書局，1985），頁516；呂青原，〈王永慶、趙廷箴合力開創臺灣石化王國〉，《財訊》49（1986年4月），頁43。

(52) 嚴演存，《早年之臺灣》（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1；再版），頁56；王克敬，《臺灣民間產業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88；第2版），頁193。

(五) 營造與建築業

營建事業包括營造工程與建築設計兩部分，營造又包括土木與機電（早期主要是水電工程）兩種。1949年前後由大陸遷臺的小型營造廠不少，大型且具代表性的有馥記營造、大陸工程、工信工程3家，這3家也是1950年代臺灣規模較大的營造公司。

馥記營造創設最早，1922年即在上海戈登路掛牌營業，創辦人陶桂林（1893-1992），字逢馥，江蘇南通呂四鎮（今啓東市）人，1904年隨父親至上海謀生，入木器廠任學徒，16歲後每日利用晚上進夜校習國文及英文，24歲考進美商在上海之營造廠工作，學習新進之鋼筋水泥高樓建築技術，30歲（1922年）自創陶馥記營造廠，1929年承建廣州中山堂，翌年承建南京中山陵第三期工程，1932年承造上海國際飯店，為當時遠東第一高樓（24層），1937年興建位於潼關風陵渡的第三座黃河大橋。抗戰時隨政府內遷重慶，參與各項軍事國防工程；1944年，為了配合戰後建設，陶馥記營造廠在重慶改組為馥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新華信託儲蓄銀行共同投資，由新華銀行總經理王志莘任董事長，陶桂林任總經理。⁽⁵³⁾ 1945年7月，公司資本增為5,000萬元，陶桂林家族出資1,600萬元，佔32%，仍是最大股東。⁽⁵⁴⁾ 抗戰勝利後，馥記營造將總公司遷設南京，並在上海、長沙、重慶、香港等地設分公司；1947年，中華民國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在南京成立，陶桂林出任第一任理事長；1948年全國工業總會在南京成立，陶桂林膺任理事長，同一年當選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陶桂林遷居臺灣，設立臺灣馥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⁵⁵⁾

陶桂林來臺灣後，繼續擔任營造同業公會聯合會理事長、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並任工商協進會理事、常務理事，因此仍是工商界的主要領導人物。馥記營造在臺灣參與了松山國際機場、圓山忠烈祠等政府工程，不過承建更多的是工業廠房（遠東紡織、中本紡織、臺北紡織等）及民間住宅、大廈。陶桂林是一位「由

(53) 國史館編，〈陶桂林先生年表〉，收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1994），第12輯，頁383-386；〈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8-23-01-71-17-004，「馥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54) 〈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8-23-01-71-17-004，「馥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頁77、101。

(55) 國史館編，〈陶桂林先生年表〉，頁387。

工匠轉變為現代營造家的典型」，⁽⁵⁶⁾對中國當代營造事業在臺灣的發展，具有歷史傳承的意義。

大陸工程公司創辦人殷之浩（1914-1994），浙江平陽縣人，在上海出生，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結構系畢業，1940年在成都創立偉達營造廠，1945年12月改組為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1,000萬元，由殷之浩、錢珽、張世傑3個家族共同出資，⁽⁵⁷⁾是標準的合夥型公司。大陸工程隨後遷往上海，1948年遷來臺灣，由錢珽任董事長，殷之浩任總經理。錢珽（1916年生）為浙江吳興縣人，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曾在中央信託局、金城銀行任職，⁽⁵⁸⁾1945年擔任大陸工程及馥記營造的董事（大陸工程的代表人），另外也是中興輪船的股東。1949年1月大陸工程的職員近30人，技術工人200人，同時搭船來臺，即賴錢珽安排。⁽⁵⁹⁾

大陸工程是臺灣最早引進使用預力混凝土工法的業者，也是臺灣最早向海外市場（琉球、關島、東南亞）拓展業務的工程公司。1969年殷之浩擔任新成立的臺北市建築投資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可說是當時臺灣營建業的代表人物。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大陸工程在臺灣的主要作品包括榮民總醫院、東海大學校舍、清華大學核子反應爐、輔仁大學體育館、圓山大飯店等。⁽⁶⁰⁾其中尤以圓山大飯店名聞中外。殷之浩除從事工程本業外，1973年轉投資臺橡公司（橡膠製品業，至今仍為大陸工程集團的核心公司），1984年與宏碁電腦合資成立宏大創業投資公司（殷之浩佔七成股份，擔任宏碁的名譽董事長），是施振榮（宏碁電腦創辦人）創業初期發展最主要的資金後援。⁽⁶¹⁾這是殷之浩對臺灣電腦產業早期發展的關鍵性貢獻。

工信工程1947年在上海成立，資本額5,000萬元，陸爾恭（1913年生，江蘇

(56) 李海清，《中國建築現代轉型》（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256。

(57) 〈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8-23-01-77-17-055，「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8)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頁347；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中華民國工商人物志》（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1963），頁719。

(59) 巫仁恕、孫可立訪問，王景玲紀錄，〈章民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呂芳上等訪問、謝采秀等紀錄，《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273。

(60)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年報，http://www.cec.tw/web/about/milestones_c.php。

(61) 廖慶洲，《當代企業家成功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158；周正賢，《施振榮的電腦傳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頁127-128。

松江縣人，聖約翰大學土木系畢業）為代表人。⁽⁶²⁾ 工信工程遷臺之後，以承作政府公共工程為著，1982年陸爾恭逝世，潘俊榮加入主導工信發展，至今工信仍以承包大型政府公共工程（交通建設）為著。⁽⁶³⁾

章民強是1949年大陸工程公司來臺職員，負責住宅工程，後於1967年創業，找上太平洋電線電纜的河北籍大股東鄭乙丑、李鴻文、孫法民等人共同成立太平洋建設公司，殷之浩參與投資，為大股東之一。⁽⁶⁴⁾ 太平洋建設早期業績甚佳，後來多角經營，設立太平洋崇光（SOGO）百貨，近幾年因建築本業經營不善，2002年失去SOGO百貨經營權（被同為上海幫的遠東集團購併），並引發多年的SOGO百貨股權訴訟。

基泰工程司與華蓋建築師事務所為1949年之前上海規模最大的建築師事務所，基泰為關頌聲（1892-1960）於1920年所創辦，⁽⁶⁵⁾ 中國當代許多著名建築師（朱彬、楊延寶、楊寬麟、關頌堅等）曾任職該公司。1949年基泰遷來臺灣，1959年中華民國建築學會（1935年在南京成立）在臺復設，關頌聲任理事長。基泰的建築風格大致上走現代主義與中國古典折衷主義，對於1950年代後臺灣建築文化演變具有一定的影響。⁽⁶⁶⁾ 1949年前曾在上海主持建築事務所而後遷來臺灣的，另有楊元麟的華信建築師事務所，王大閔的五聯建築師事務所（來臺後的代表作品包括臺北國父紀念館、外交部大樓等）、張昌華的華泰工程師事務所（1948年協助國防醫學院遷建臺灣，遷臺早期作品包括清華大學原子爐、臺北教師會館）等；曾在上海擔任建築師，而後來臺灣發展較著名之建築師，包括張亦煌（來臺設立永立建築師事務所）、姚岑章（設永華建築師事務所）、陳其寬（代表作為與貝聿銘合作之東海大學路斯義教堂）。⁽⁶⁷⁾

(62)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中華民國工商人物志》，頁522；〈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8-23-01-72-17-034，「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3) 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89年度年報〉，<http://doc.tse.com.tw/server-java/t57sb01>。

(64) 呂芳上等訪問，謝采秀等紀錄，〈章民強先生訪問紀錄〉，頁274；廖慶洲，《當代企業家成功的故事》，頁160。

(65) 關頌聲（1892-1960），廣東人，在天津出生，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留美麻省理工學院習建築，1920年在天津創基泰工程司，後在全國各城市設分公司，1930年代將事務所移至上海。

(66) 李乾朗，《20世紀臺灣建築》（臺北：玉山社，2001），頁109。

(67) 參見熊純生主編，《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第三冊，頁1885-1903。

(六) 其他民生用品製造業

1953年臺灣民營工廠中皮革業者共67家，資本額最高的兩家為「臺灣新源昌製革廠」(1948年9月設立，資本20萬元)、「大中華製革廠」(1952年3月設立，資本30萬元)，經營者馬永槐(1920年生，浙江鄞縣人)、周繼成(1920年生，浙江紹興人)、周世玉(1920年生，浙江紹興人)全部來自上海協源昌製革廠。⁽⁶⁸⁾

醫藥方面，臺灣光復後不少臺灣人藥師自日本返臺開設西藥廠，不過以製造成藥者居多，製針劑及片劑者以上海遷來的藥廠較著名，如信誼化學製藥廠、生生化學製藥廠等。⁽⁶⁹⁾信誼化學製藥於1930年成立，由何子康(藥劑師)、霞飛(德國籍藥學博士，經營信誼大藥房)發起登記設立於上海，何子康任總經理，堪稱遠東第一大藥廠。⁽⁷⁰⁾1948年10月上海信誼製藥在臺灣設辦事處，1949年後改為臺灣信誼化學製藥廠。⁽⁷¹⁾

臺灣光復初期(1946年前後)，肥皂只有洗滌皂，香皂、藥皂需仰賴進口。1949年後，因大陸業者將技術帶來，開始製造香皂與藥皂，品質、包裝均佳，當時認為是肥皂工業的一大進步，代表性的工廠包括上海遷來的派克化工廠、香港遷來的美琪化工廠、南僑化工廠、臺灣人經營的中光肥皂廠等。⁽⁷²⁾美琪化工廠董事長李潤田(上海人)、總經理吳浩源(福州人)都在上海營商，1949年後先到香港，後將香港美琪化工廠遷移臺灣；南僑化工廠經營者陳其志原籍福建，但在上海經營華強紡織，1949年後先到香港，繼而來臺經營化工廠，「南僑水晶肥皂」是臺灣著名商品，其子陳飛龍後來將南僑擴展為多角經營的企業集團。⁽⁷³⁾

「明香花露水」為上海明星香水肥皂廠之產品，在大陸已負盛名，⁽⁷⁴⁾周文璣

(68)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編，《臺灣省民營工廠名冊》，上冊，頁325；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中華民國工商人物誌》，頁197、348；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頁84。

(69)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編，《臺灣的民營工業》，頁78。

(70) 〈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2-23-01-71-11-041，「信誼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集團處方藥事業部網站，<http://www.sinepharm.com>。

(71)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頁33。

(72) 李益銘，〈臺灣之肥皂工業〉，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工業論集》，卷二，頁163。

(73)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頁73、203、215。

(74) 中西藥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中西藥廠百年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0)，頁9-23。

在 1949 年 5 月共軍接管上海前夕來臺，與先前來臺灣設辦事處的 5 位員工重建明星香水肥皂廠，周文璣後來發起成立臺灣區日用衛生化妝品工會，任理事長 20 餘年。(75)

黑人牙膏是好來化工公司的著名產品，1933 年在上海設廠開始生產，1949 年好來化工遷移臺灣，繼續生產，黑人牙膏至今仍是臺灣馳名商標。

臺灣的調味粉（味素、味精）工業在戰後才開始發展，初期產量最大的 3 家是天香味寶廠、太平洋化學工業廠、五大化工廠。(76) 1937 年天香味寶廠成立於上海，經理何維石，(77) 1948 年 10 月天香味寶廠在臺灣高雄重新設廠登記，何維石任總經理（代表人）。(78) 上海遷臺的調味粉廠中比較重要的還有天昌化工廠，董事長范樹元，范樹元同時兼任太平洋化學工業廠常務董事。(79)

食品也是民生必需工業，上海商人來臺經營的食品業中，較具代表性的有嘉和麵粉、梅林罐頭、臺富餅乾等公司。

嘉和麵粉原為上海商人徐偉峰、張敏鈺、林炳軒、翁明昌等人共同投資，初期由林炳軒任董事長，後張敏鈺、翁明昌等人退出，股權幾經變化，到了 1970 年代趙常恕、韓浩然為代表的山東商幫大成長城集團接收經營嘉和麵粉，張敏鈺、翁明昌、李文輝等上海商人另組嘉新麵粉公司。(80)

上海梅林罐頭食品廠成立於 1933 年，股東之一的顧士奇任經理；(81) 1948 年臺灣梅林罐頭食品廠在嘉義設立，顧士奇、張鈺卿為核心人物，1953 年時資本額只有 75,000 元，至 1970 年已增為 1,100 萬元，為當時重要的罐頭食品工廠。(82)

(75) 國史館編，〈周文璣女士事略〉，收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1998），第 18 輯，頁 93。

(76) 魏岳壽，〈臺灣之調味粉工業〉，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工業論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卷一，頁 45。

(77) 〈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8-23-01-72-04-168，「天香味寶廠股份有限公司」。

(78)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編，《臺灣省民營工廠名冊》，上冊，頁 330。

(79) 〈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8-23-0172-04-103，「上海模範味粉廠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頁 143。

(80)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臺北：中華徵信所，1972），1972 年版，頁 888；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臺北：中華徵信所，1983），1982/1983 年版，頁 905。

(81) 〈經濟部商業司檔案〉，18-23-01-72-04-126、127，「梅林罐頭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82)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編，《臺灣省民營工廠名冊》（臺北：臺灣省政府建設廳，1953），下冊，頁 494；中華徵信所，《臺灣區集團企業研究》，1972 年版，頁 726。

劉文騰是英國紡織博士，遷臺的申一紡織首任總經理，1956年與申一董事長王雲程及美商公司共組福樂奶品公司，生產牛奶、冰淇淋（招牌產品是小美冰淇淋）等食品；1965年劉文騰、王雲程結合紡織界的上海商人顧興中、徐有庠及臺灣商界的陳雲龍、林燈等創立臺富食品公司，生產餅乾、糖果、麵包等，⁽⁸³⁾對於臺灣食品業產品、類型、品質的提升具有領導作用。

五、在臺上海商人與企業的起落

在1950年代，紡織、營造、化學工業、食品業、木材業、海運業等，上海來的商人與企業都扮演重要角色，不過隨著經濟發展與環境演變，臺灣本地人所經營的企業愈來愈見突出。1970年臺灣一百大企業（製造業）中，屬於1949年後來臺外省籍商人所直接經營或主要投資的公司共29家，其中與上海商人有關者24家，約佔全部家數的四分之一，包括裕隆集團的裕隆汽車、臺元紡織；遠東集團的亞洲水泥、遠東紡織；嘉新集團的嘉新水泥、益新紡織；電線電纜業（部分為上海商人與河北商人合夥投資）的太平洋電線電纜、華新麗華電線電纜；紡織業（包括化學纖維）的中國人造纖維與聯合耐龍（兩家均與臺灣籍商人合夥）、華隆公司、中興紡織、正大纖維、國華化工、利華羊毛、正大尼龍、新光標準內衣、益華紡織、申一紡織；化工業的華夏海灣塑膠、臺灣聚合化學品；木材合板業的復興木業與開南木業；機械業的良友工業等。⁽⁸⁴⁾

1990年時，臺灣排名前一百大製造業中屬於第一代外省籍商人（或其子女）經營者18家，其中與原始上海商人密切相關的公司剩下12家，分別是遠東集團的遠東紡織、亞洲水泥，裕隆集團的裕隆汽車、中華汽車、臺元紡織，以及同屬紡織業的中興紡織（紡織、成衣）、華隆公司（化學纖維），電線業的華新麗華公司，塑膠石化業的華夏海灣、福聚公司、臺灣聚合公司，食品業的嘉新麵粉。⁽⁸⁵⁾

到了2006年，根據臺灣《天下雜誌》的調查，這些老外省籍商人經營的傳統產業及其轉投資事業，尚能排入臺灣一百大製造業（以母公司及轉投資子公司合

(83) 中華徵信所，《臺灣區企業集團彙編》，1971年版，頁43-6、43-7。

(84) 中華徵信所，《臺灣區59年度壹佰家最大民營企業》（臺北：中華徵信所，1970），頁10-16。

(85) 中華徵信所，《中華民國大型企業排名》（臺北：中華徵信所，1991），頁2-4。

併報表方式計算，依營業收入金額排序）的只剩 12 家，其中屬於上海幫者 8 家，包括遠東集團兩家（遠東紡織、亞洲水泥）、華新麗華集團 3 家（華新麗華、瀚宇彩晶、華邦電子）、裕隆集團兩家（裕隆汽車、中華汽車），以及臺灣聚合化學公司；另 3 家為與山東幫有關的福特六合汽車、神基科技、大成長城實業。⁽⁸⁶⁾

依中華徵信所的調查統計，若以集團資產總額 (total assets) 多寡為序排名，2004 年度臺灣百大企業集團中，屬上海幫者共 8 家：遠東 (排名 11)、裕隆 (30)、華新麗華 (32)、華隆 (39)、大陸工程 (83)、臺灣聚合 (89)、嘉新水泥 (97)、太平洋建設 (99)；⁽⁸⁷⁾ 若以集團淨值 (net worth) 高低為序，上海幫進入百大的一樣是這八個集團，但先後順序有些變化：遠東 (4)、華新麗華 (7)、裕隆 (13)、大陸工程 (73)、嘉新水泥 (94)、臺灣聚合 (95)。屬於上海幫以外的其他外省籍者 4 家：力霸 (28)、聯合神通 (42)、潤泰 (49)、東森 (66)。⁽⁸⁸⁾ 到了 2006 年度，百大企業集團中，屬上海幫者減為 7 家：遠東 (排名 12)、華新麗華 (25)、裕隆 (29)、華隆 (40)、大陸工程 (76)、臺灣聚合 (83)、嘉新水泥 (97)，太平洋建設 (112) 退出榜外。⁽⁸⁹⁾

在 1950、60 年代的臺灣工商界主要行業中，有一半以上（接近六、七成）為上海商人所經營，20 年後（1970 年）僅剩四分之一，50 年後約剩十分之一。原因有幾方面：(1)經營不善，自然淘汰；(2)第二代無意願繼續經營，臺灣又非故鄉，往往移民海外，六、七十年代有能力移民海外（主要是美國）的多屬外省籍工商業者；(3)紡織業是上海商人經營的主業，隨著臺灣產業結構的改變，大量下游的中小型染整織布成衣業從 1980 年代晚期開始沒落，若無法成功轉型（包括前往大陸投資），只能歇業結束；(4)上海商人早期依恃的有利政商關係，隨著時代變化逐漸失去作用。

成功轉型永續經營的上海幫企業集團仍不少，下面舉一些例子。

遠東集團以紡織業起家，最早從事內衣織造及紡紗，到了 1960 年代中期，遠東紡織從紡紗、織布、印染到成衣一應俱全，因應時代發展，還跨足生產化學纖

(86) 《天下雜誌》371 (2007 年 5 月)，頁 163-207。

(87)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臺北：中華徵信所，2005)，2006 年版，頁 60-62。

(88) 同上註，頁 22-23

(89)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臺北：中華徵信所，2007)，2008 年版，頁 60-63。

維的上游原料。臺灣成衣業主要供外銷出口，遠東集團不但出口成衣，同時也內銷——設立遠東百貨公司（1967），跨入流通業。遠東百貨是臺灣紡織業者經營百貨業的第一家，也是臺灣大型連鎖百貨公司的先驅。1990年代以後，遠東集團已發展為跨足石油化學、人纖紡織、水泥建材、百貨零售、金融服務、海路運輸、通訊網路、營造建築、觀光旅館、資訊服務等領域的多角經營集團，2006年集團的營收淨額（Net Sales）為新臺幣3,513.63億元，在臺灣企業集團規模中排名第十，若以淨值（net worth）計算，為3,794.13億元，排名第五。⁽⁹⁰⁾以單一公司而論，遠東紡織是目前臺灣規模最大的紡織公司，2006年合併營業收入（含轉投資公司）達新臺幣1,434億元，稅後純益83.37億元；遠傳電信為遠東集團的新興電訊通信事業，目前規模在臺灣行動電話業者中僅次於公營的中華電信，排名第二，2006年營業收入新臺幣672億元，稅後純益130.17億元；遠東百貨2006年營業收入新臺幣794億元（百貨業最高），稅後純益5.86億元；太平洋崇光百貨2006年營業收入新臺幣293億元，稅後純益14.54億元，（兩家合計）在百貨批發零售業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統一超商（7-ELEVEN，營業收入1,329.45億元）。⁽⁹¹⁾

相較於遠東集團涉入各種行業的多角化經營，同樣來自上海的裕隆集團經營作風顯得比較保守。裕隆汽車為嚴慶齡、吳舜文夫婦創辦，裕隆早期從造製紡織機及船用柴油引擎入手，目標則是發展汽車工業。起初臺灣政府決策官員基於臺灣機器工業基礎薄弱的理由，並不支持裕隆投入汽車生產事業，但嚴慶齡認為工業報國非從發展汽車工業入手不可，因此排除萬難，堅決設廠。1956年裕隆完成試製第一部吉普車，翌年與美國來米漢納金屬公司及威力斯公司（Willys Motor Inc.）合作，生產第一批10輛吉普車，1960年裕隆改稱「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這是臺灣汽車工業的肇端。⁽⁹²⁾

裕隆投入汽車生產製造的早期（1953-1967），臺灣將汽車工業列為保護產業，禁止設新廠，對進口汽車也多般限制，形成裕隆獨占市場時期。一方面，裕隆公司在艱困的環境中以開發民族工業的使命感撐持，成立後到1962年均處於虧損狀

(90)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8年版，頁211。

(91) 天下雜誌社編，〈2007年一千大調查〉，《天下雜誌》371，頁163、293。

(92) 王克敬，《臺灣民間產業40年》，頁210；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汽車產業傳》（臺北：中華徵信所，1999），頁15-16。

態（靠臺元紡織盈利挹注），1963年第一次盈餘1,700餘萬元；⁽⁹³⁾另一方面，臺灣的工業基礎薄弱與有限的市場使裕隆的小轎車品質提升緩慢，一般社會大眾對裕隆享受保護而無競爭力屢屢批評。1967年之後臺灣汽車設廠限制取消，1969年裕隆轉投資成立中華汽車（與日商三菱自動車技術合作生產中型卡車、商用車），跟臺灣的其他汽車製造（裝配）廠商公平競爭。1969年是裕隆集團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除了設立中華汽車，也設立了幾家生產汽車周邊零件的汽車器材公司，另外，臺元紡織在這一年轉投資成立臺文針織公司，從事針織布、成衣生產。臺灣的大型紡織公司在1970年代前後紛紛向上游整合，設立化纖原料生產部門（或公司），只有臺元紡織一直固守紡紗、織布、成衣領域，雖然營業額一度不如其他後起的紡織業者，但也少了大起大落的危機，即使在1990年代之後紡織業長期不景氣的環境下，臺元依然穩定獲利，獲利率（Profit/Sales）在紡織同業中一向排在前幾名，是紡織產業的模範生；2006年臺元紡織營業收入（31.26億元）在臺灣製造業的排名是612，獲利率則是第3名（稅後純益18.23億元）。⁽⁹⁴⁾

1986年裕隆自行設計開發的小客車「飛羚101」上市，是臺灣汽車工業史的里程碑，雖然「飛羚101」品質不夠理想，銷售並不成功，但裕隆卻因此培養了一批汽車工業設計人才，後來逐漸開花結果，1988年中華汽車自行開發設計的「中華威利」上市，就是一部銷售成功的商用車，它後來被成功導入中國大陸（1996）與印度（2001）生產銷售；裕隆培養出來的汽車改款設計人才近幾年離職創業，成為大陸汽車製造業的重要推手，大廠如上海通用汽車的技術中心，小廠如浙江吉利汽車與安徽奇瑞汽車的設計製造，均有濃厚的臺灣（裕隆）經驗成分。⁽⁹⁵⁾由於裕隆的研發設計能力較強，提高了汽車設計改款的成效，最近十年裕隆與中華兩家汽車工廠的合併營業收入一直高居臺灣汽車業首位，獲利能力也相當穩定。

裕隆集團長期經營紡織與汽車相關事業，1990年代才開始跨入電子科技產業，不過所投資的公司均屬中小型的專業公司，如華晶科技（1996設立，生產數位相機）、嘉晶電子（1998設立，生產磊晶矽晶圓）等。2006年裕隆集團的營收淨額為2,257.09億元，在全臺灣企業集團中排名第二，淨值2,325.73億元，排

(93) 曾勇義，〈臺灣之汽車工業〉，《臺灣經濟金融月刊》5: 10（1969年10月），頁20。

(94) 天下雜誌社編，〈2007年一千大調查〉，頁191。

(95) 陳良榕，〈飛羚經驗 大陸開花〉，《天下雜誌》347（2006年5月），頁208-212。

名十一。(96)

華新麗華集團目前是臺灣第一大電線電纜集團，不過，論其淵源則始於 1950 年代的太平洋電線製造廠。太平洋電線的創始人爲孫法民（河北籍），1930 年代在天津辦永光電線廠，中日戰爭結束後（1946 年）永光電線在北京、上海設廠，焦廷標（江蘇省江陰縣人）擔任上海廠的工程師；1948 年永光幹部隨公司遷來臺灣復業，1950 年改組爲太平洋電線製造廠，1958 年改稱太平洋電線電纜公司。(97) 焦廷標原爲太平洋電線股東，1966 年另創華新電線，1969 年合併麗華電線，改稱華新麗華電線電纜公司，主要股東包括焦廷標、孫法民、翁明昌等人，焦廷標負責經營。(98) 2006 年華新麗華營收淨額爲 1,234 億元（製造業排名第二十二），稅後純益 84.96 億元。(99) 1980 年代後期華新麗華開始轉投資電子科技產業，先後設立華邦電子（1987，從事積體電路設計製造，2006 年資本額達新臺幣 569.6 億元）、華新科技（1992，生產資訊通信零組件，資本額 36 億元）、瀚宇彩晶（1998 年，生產 LCD 顯示器，2006 年資本額 605 億元）、瀚宇博德（1989，生產印刷電路板，資本額 23 億元）。2006 年華新麗華集團營收淨額爲新臺幣 2,803.08 億元（各單一公司合併計算），在臺灣集團企業中排名第二十五，淨值 2,169.71 億元，排名第十二。(100)

資訊通信等高科技產業是資本、技術密集而且風險高的行業，許多傳統產業從事多角化經營時，多跨入電子科技領域。遠東集團投資通訊產業，華新麗華投資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屬於資本及技術門檻較高的產業，獲利與風險都高。瀚亞彩晶屬於光電產業，2004 年稅後純益 25 億新臺幣，2005 年則虧損 95.5 億，2006 年仍虧損 48.05 億。(101)

以臺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爲核心的臺聚集團，其形成溯源自趙廷箴。趙廷箴在 1964 年與王永慶結束合作之前，於 1960 年即邀集友人及外資巴拿馬商 Mobil Investment 參加投資，成立臺達化學工業公司，生產電木粉、EPS 等塑膠

(96)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6 年版，頁 379。

(97) 廖慶洲，《當代企業家成功的故事》，頁 188。

(98)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1982/1983 年版，頁 148、153。

(99) 天下雜誌社編，〈2007 年一千大調查〉，頁 163。

(100)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8 年版，頁 357。

(101) 參見《天下雜誌》一千大調查，2005 年、2006 年、2007 年版。

原料，開臺灣塑膠工業引進外商共同投資之先河。⁽¹⁰²⁾ 1968年5月趙廷箴將華夏塑膠60%股權出售予外資巴拿馬海灣石油公司，改稱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產銷PVC粉、粒、塑膠皮布等；另外，趙廷箴在1966年設立美寧工業（製造塑膠類玩具），其中有半數美商資本，⁽¹⁰³⁾ 加上1977年成立的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膠膜原料LDPE），這些公司都由趙廷箴擔任董事長，逐漸形成華夏海灣企業集團，早期是僅次於臺塑集團的塑膠中間原料與成品生產集團。1990年代後趙廷箴逐漸退出華夏海灣相關企業，集團重組，形成以臺灣聚合、臺達化工、亞洲聚合、臺灣氯乙烯、華夏海灣等公司為核心企業之臺聚集團，核心領導人為吳亦圭。吳亦圭為吳壽松之子，吳壽松原籍浙江永嘉，早年在上海習商，1949年來臺灣自營化工廠，並代理進口化工產品銷售（固齒玉牙膏、密絲佛陀Max Factor化妝品），後來投資臺灣聚合化學品公司（簡稱臺聚公司，1965年創辦，主要資金來自美商國民製酒及化學公司投資，生產塑膠原料聚乙烯⁽¹⁰⁴⁾）任常務董事，1982年美商將其所有股份（43%）售予吳壽松家族（以香港誠利置業公司名義購入），1997年臺聚以轉投資方式將趙廷箴創立的華夏塑膠集團（華夏海灣、臺達化工、亞洲聚合、臺灣聚乙烯工業等公司）納入臺聚集團。⁽¹⁰⁵⁾ 臺聚除經營石化、塑膠製品之外，也投資被動電子原件及電子零組件產業，2006年集團營收淨額439.16億元，在臺灣集團企業中排名七十二，淨值212.82億元，排名八十一。⁽¹⁰⁶⁾

除了上述以製造業為主的企業外，上海民營金融業者遷臺者只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上海銀行）一家。上海銀行為陳光甫創辦，1919年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以茂新、福新、申新公司名義入股，據1921年的股本統計，榮家投資40萬銀元，約佔當時總資本額182.4萬銀元的22%，⁽¹⁰⁷⁾ 為當時最大股東；1949年中國局勢

(102) 中華徵信所，《塑膠工業》（臺北：中華徵信所，1982），頁176、186。

(103) 中華徵信所，《臺灣區企業集團彙編》，1971年版，頁30-3、30-5、30-6。

(104) 臺聚公司創辦之初由美商國民製酒及化學公司（NDCC）獨家投資，張植鑑任董事長，席德鰲任總經理，後經增資，美方保留50%資本，新加入股東包括辜濂松、吳壽松、臺北中小企銀等。中華徵信所編，《塑膠工業》，頁182。

(105) 中國名人傳記中心編，《中華民國現代名人錄》（臺北：中國名人傳記中心編印，1982），頁268；臺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年報〉，<http://newmops.tse.com.tw>。

(106)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8年版，頁919。

(107)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35-44。

變化之後，該行香港分行重新登記註冊為「上海商業銀行」，仍由陳光甫任董事長；1954年上海銀行召開在臺股東大會，重選董監事，登記成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管理處，但遲至1964年6月才奉准復業，1965年6月正式開始在臺營業。1980年代中期榮鴻慶（榮宗敬三子）擔任上海商銀副董事長（1991年升任董事長），掌握經營管理權之後，積極增設分行，拓展業務，1990年代起獲利明顯提升，從1986年以前每年盈餘1億多元新臺幣，增為每年數十億新臺幣，⁽¹⁰⁸⁾獲利率常居臺灣銀行業的前三名，2004年至2006年臺灣各銀行因現金卡與信用卡呆帳過多而嚴重虧損或獲利大減時，上海商銀卻因穩健經營分別獲利（稅後盈餘）新臺幣53億（獲利率34%）、88億元（獲利率28%）、115.8億元（獲利率35%），獲利率名列所有銀行前三名內，堪稱金融業中銀行體系的模範生。⁽¹⁰⁹⁾

六、投資中國

1979年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政策，將過去的計畫經濟體制逐漸調整為市場經濟體制，招來外商到大陸投資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政策。臺灣則是從1980年代中期以後，因國際景氣趨緩，世界各地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加上新臺幣大幅升值、工資上漲、勞工短缺，許多勞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經營愈來愈困難，而中國大陸廉價的勞工與提供外商的諸多優惠措施，對臺灣企業具有相當吸引力。1981年第一家臺商到中國設廠，⁽¹¹⁰⁾早期前往中國的臺商因屬非法，多屬小型企業或以個人名義投資，1991年經濟部公佈「對大陸地區投資及技術合作管理辦法」，1992年制訂通過「臺灣地區與中國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正式准許企業或個人前往大陸投資，大型企業才正式開始規劃在中國大陸的佈局。有上海商人背景的（臺商）大型企業前往中國投資最早的是中興紡織集團。

中興紡織為上海商人鮑朝樞來臺灣創設，從小型的內衣製造廠起家（1949年在臺北縣三重設中興織造廠，資本額15萬元，員工75名，生產「三槍牌」內衣），

(108) 陳逸平總編輯，《上海銀行九十年》（臺北：上海商業儲蓄銀行，2005），頁126-127、201。

(109) 參見《天下雜誌》歷年一百大金融業排行調查。

(110) 工商時報編，《大陸臺商1000大》（臺北：商訊文化事業公司，2005），2005年版，頁35。

逐漸發展為從上游的人纖製造到下游的成衣、百貨公司（中興百貨）一應俱全的紡織企業集團。1980年代中期臺灣的紡織業開始走下坡，許多業者獲利率逐年降低，中興紡織到了199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巨額虧損，不過早在1989年中興紡織就在上海設金寶興製線公司，經營批發零售，1991年設上海三槍製衣廠，經營成衣，1994年設中興投資（中國）股份有限公司，迄2006年為止，資本額3.18億人民幣，為投資中國的核心公司。目前中興紡織在中國大陸（香港不計入）共投資10家公司（1995年以後未再投資設廠），其中除設於南昌的食品工廠外，其餘均為紡織相關行業，有6家公司設於上海地區。⁽¹¹¹⁾ 根據《工商時報》的調查，2006年臺商在大陸投資的一千大公司中，中興投資（中國）公司排名538，營收淨額3.50億人民幣，稅前純益0.20億人民幣。⁽¹¹²⁾ 根據中華徵信所的調查，中興紡織集團在2004年虧損11.35億新臺幣，2005年虧損34.05億新臺幣，2006年仍虧損11.34億新臺幣，⁽¹¹³⁾ 前往大陸投資顯然未能挽救集團的頹勢。

遠東企業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起步較晚，1995年11月在上海設立亞力水泥製品公司，經營水泥製品與預拌混擬土；1996年在上海成立遠紡工業有限公司，從事聚酯棉、聚酯絲（化學纖維）的生產銷售。十年之間，遠東集團的大陸投資進展極速，包括2002年因為併購臺灣的太平洋崇光百貨，遂同時取得大陸各省多家太平洋百貨之經營權（最早設立的是1993年成都春熙太平洋百貨），到2006年止，遠東集團在中國大陸（含香港）投資經營的公司共54家，分散成都、重慶、上海、蘇州、無錫、南昌、武漢、北京、天津、大連等地，投資種類包括紡織、百貨、石化、人纖、水泥、運輸、網路資訊服務等行業，幾乎是臺灣多角經營的翻版；在上海、四川各投資7家最多，其中資本額較大的是上海遠紡工業（11.64億人民幣）、上海亞東石化（資本額1億美元）。2006年遠東投資中國大陸之各公司營收淨額約586.59億新臺幣，佔遠東集團總營收（3,513.63億新臺幣）的百分之十七。⁽¹¹⁴⁾ 遠東集團投資大陸的水泥、百貨行業均有不錯的盈利，屬於紡

(111)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臺北：中華徵信所，2007），2008年電子版。

(112) 工商時報編，《大陸臺商1000大》（臺北：商訊文化事業公司，2007），2007年版，頁88。

(113) 參見《天下雜誌》2005年至2007年一千大企業排名特刊。

(114) 《天下雜誌》2005年至2007年一千大企業排名特刊；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8年版，頁211；另參考遠東集團網站：<http://www.fetil.com.tw>。

織上游的石化產業投資大，但多數仍在虧損狀態。

裕隆集團在大陸的投資始於1993年在山東德州成立元濟紡織公司(生產牛仔布)，1994年設立瀋陽金亞公司(生產車用傳動軸)，之後展開紡織、汽車、資訊、電腦、光電各項投資案。紡織業的投資分散於山東、廣東(中山)、江蘇(無錫)、上海等地，從事下游的織布、成衣生產；汽車業較重要的投資是1995年與福州汽車工業集團合資設立東南汽車公司，生產商用車(輕客車)；2000年與東風汽車集團在廣東成立風神汽車公司，生產日產(Nissan)系列轎車(小客車)。到2006年止，裕隆集團在中國(含香港)投資的公司65家，2006年營收淨額478.98億新臺幣，約佔裕隆集團該年營收淨額(2,257.09億新臺幣)的百分之二十一。⁽¹¹⁵⁾

華新麗華集團的大陸投資始於1992年，在江蘇省江陰(華新麗華創辦人焦廷標的故鄉)設立江陰華新鋼纜公司，生產橋樑纜索鋼絲、鋼絞絲，之後陸續在武漢、杭州、上海、南京、合肥、常熟等地設立生產電線電纜的相關企業，電子資訊產業的投資設廠也相當積極，分別在上海、南京、深圳、東莞、廣州、昆山、蘇州、江陰等地設廠。到2006年止，華新麗華在中國投資的公司62家，大陸地區(含香港)投資營收1,019.86億新臺幣，佔該年華新麗華集團總營收(2,803.08億新臺幣)的百分之三十六，比例相當高。⁽¹¹⁶⁾2005年華新麗華集團(單一公司合併計算)營收淨額新臺幣751億元(獲利15.6億元)，2006年營收淨額增為新臺幣1,234億元(獲利84.7億元)，營收獲利均大幅增長主要是拜大陸內需市場強勁需求所致。⁽¹¹⁷⁾

根據中華徵信所的調查，2004年在大陸(含港澳)投資的臺灣企業集團，營業收入排名前一百大中，屬於傳統上海商幫的只有6家，分別是華新麗華(排名10)、裕隆集團(19)、遠東集團(20)、嘉新水泥(63)、大陸工程(61)、臺聚集團(66)；⁽¹¹⁸⁾2006年的統計減為5家：華新麗華(排名13)、遠東集團(18)、裕隆集團(22)、臺聚集團(66)、大陸工程(71)，嘉新水泥則跌出榜外。⁽¹¹⁹⁾若以

(115)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8年版，頁415；裕隆企業集團網站：<http://www.yulonggroup.com.tw>。

(116)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8年版，頁357。

(117) 《天下雜誌》372(2007年5月)，頁143。

(118)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6年版，頁74-75。

(119) 中華徵信所，《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8年版，頁76-77。

個別公司來看，2005年中國大陸臺商營收排名前一百大中，屬於上海商人返回中國投資的公司只有6家：南京瀚宇彩新科技（排名14，華新麗華）、東南汽車（34，裕隆集團）、南京華新光電（36，華新麗華）、彩晶光電（41，裕隆集團）、遠紡工業（46，遠東集團）、東莞華新電線電纜（57，華新麗華）。⁽¹²⁰⁾ 2006年增為9家，除前述6家外，增加申華化工（大陸工程集團）、亞東石化（遠東集團）、瀚宇博多科技（華新麗華）。⁽¹²¹⁾

原上海幫在大陸投資入榜2006年臺商一千大最多的是華新麗華集團與遠東集團，各13家，裕隆集團入榜6家，嘉新水泥集團3家，臺聚、南僑、大陸工程各1家。⁽¹²²⁾ 換句話說，臺商投資大陸跟省籍屬性沒有太多關連。

從企業永續經營的角度看，到中國大陸投資是多數企業求生存與全球佈局必要的選擇，1991年政府准許臺灣的企業透過第三地轉投資的方式前往大陸投資之後，絕大多數大型企業均前往大陸投資，當時正值天安門事件之後歐美日各國對中國大陸投資卻步的時期，臺商「勇敢」西進，90年代初期投資額一度佔大陸外資的第二位。大陸臺商不乏當年被視為「遷廠逃資」之輩，此時登陸，有幾分雪中送炭的意味。

近十餘年來臺灣的投資與經營環境日益惡化，1996年政府當局對臺商投資大陸開始執行戒急用忍政策，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執政當局仍舊以政治（甚至是意識型態）的理由，並以行政措施或道德勸說約束工商業者繼續「戒急用忍」，主要理由有二：一為國家安全（這也是反對兩岸直航的理由），二為經濟安全，認為大陸若發生經濟危機，臺灣經濟將被嚴重波及。

不過，十年過去，政府政策何嘗阻卻臺商西進的腳步？根據經濟部的資料，1991-1999年間，臺商平均每年赴大陸投資金額16.11億美元，民進黨執政之後，雖然對兩岸關係採取緊縮政策，但臺商投資大陸的腳步反而加快，2000年為26.07億美元，2000-2006年的7年間臺商投資大陸金額基本上逐年遞增，投資金額合

(120) 工商時報編，《大陸臺商1000大》（臺北：商訊文化事業公司，2006），2005-2006年版，頁50-52。中小型上海經營企業集團到上海投資的也不少，例如南僑集團陳飛龍自1997年起在上海經營的寶萊納餐飲連鎖公司，即甚著名。

(121) 工商時報編，《大陸臺商1000大》，2007年版，頁68-70。

(122) 根據同上註統計。

計 404 億美元，平均每年為 57.72 億美元，2006 年單一年度達 76.42 億美元，2007 年更創下年度歷史新高的 99.70 億美元。⁽¹²³⁾ 這些還不包括未申請而以其他方式迂迴進入大陸的資金（包括在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等海外據點設公司者）。

從近三年（2004 年-2006 年）大陸臺商一千大的相關業績統計，可以看出臺商投資大陸的商機所在：營收總額由 7,334 億元人民幣增為 13,168 億元人民幣，稅前純益由 187 億元人民幣增為 402 億元人民幣，純益率由 3.84% 增為 4.53%，資產總額由 4,424 億元人民幣增為 7,248 億元人民幣，淨值總額由 560 億元人民幣增為 786 億元人民幣，（1,000 家臺商中）賺錢家數由 750 家增為 864 家，虧損家數由 180 家減為 133 家。⁽¹²⁴⁾

上述的成果是在臺商受到政府部門諸多限制下所取得，限制之一是政府當局規定臺商投資大陸的總金額最高不得超過臺灣母公司資產淨值的 40%（資本額新臺幣 50 億元以下者 40%，50-100 億元者 30%，100 億元以上者 20%），許多企業為了便於運用資金，遂採取將母公司減資的辦法，從 2000 年底至 2005 年 7 月，已有五分之一的上市上櫃公司辦理減資。⁽¹²⁵⁾ 2006 年 9 月宜蘭食品公司（旺旺集團的母公司）宣布將公司資本額從新臺幣 4.57 億元減為 1,000 萬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¹²⁶⁾

近幾年臺灣企業申請股票在臺灣集中市場新上市的公司，從 2002 年的 85 家逐年遞減，2003 年剩 45 家，2004 年 38 家，2005 年 13 家，2006 年 11 家，2007 年迄 10 月止 11 家，⁽¹²⁷⁾ 但募資甚少，11 家合計約等於臺商統一（中國）控股公司一家 2007 年 11 月在香港上市的募股金額（新臺幣 265 億）；⁽¹²⁸⁾ 相反的是，2005 年臺灣企業申請股票下市 19 家，2006 年下市 14 家，2007 年 20 家，⁽¹²⁹⁾ 顯示

(123) 參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統計資料，<http://www.moeaic.gov.tw/>。

(124) 工商時報編，《大陸臺商 1000 大》，2007 年版，頁 114。

(125) 《天下雜誌》356（2006 年 9 月），頁 114。

(126) 同上註，頁 114。旺旺集團在大陸有一百多家分公司，2006 年上半年在中國的營業額達 4 億美元。

(127) 參見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tse.com.tw/ch/listed/listed_company/apply_listing.php 統計資料。2007 年全年新上市共 30 家，其中包括上櫃轉上市 13 家，故真正新上市 17 家。

(128) 中時電子報，2007 年 11 月 19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611190121+96111904+0+102146+0,00.html>。

(129) 參見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tse.com.tw/ch/listed/listed_company/apply_listing.php 統計資料。

臺灣的資本市場正在萎縮中。

中國大陸目前是世界工商業者最大的練兵場（既是生產工廠也是銷售市場），臺商利用大陸作為生產基地競逐全球市場（也包括中國市場），既求生存也賴以壯大，壯大的企業才有世界競爭力。

七、結語

1949年前後，許多中國大陸（特別是上海地區）的企業與商人基於對共產黨與社會主義的疑慮，選擇將企業移往海外，尤其是香港與臺灣成為他們延續企業生命或重新起步的主要基地。站在中共新政權初建，急於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立場，自然指責外移的工商業者之行為是「遷廠逃資」，等於是背叛祖國。如今回顧這一段歷史，弔詭的是反而應該對遷廠逃資的企業與商人給予肯定。第一，因為遷廠及轉移資金、人才，反而得以保留清末以來中國剛剛建立發展起來的一部分近代工商企業，免於盡淪為計畫經濟體制下的犧牲品；第二，「遷廠逃資」的資金與人才築造了當代香港與臺灣早期工業發展的基礎，也使這兩地在1960年代一起搭上世界性發展輕工業的列車，成為亞洲四小龍的要角；第三，也因為這些「外逃」的商人使近代中國的工商業發展保留了部分元氣，經過數十年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磨練，累積了相當資金與現代企業經營觀念與管理智能，當1980年代中國重新對世界開放時，香港與臺灣的企業能夠適時提供大量資金、設備、技術與管理人才，成為大陸發展市場經濟的主要外資來源，為中國近二十年來經濟持續成長與發展的重要因素。

上海的企業與商人在1950年代初期到臺灣時，跟隨而來的設備、資金、專業人才，對臺灣後來的工商業發展具有正面作用，自無庸置疑。當然，因為國民黨政府當時剛從大陸遷移臺灣，過去的政商人脈關係（不少外省籍工商業者具有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身分），使上海來臺企業與商人必然較臺灣本地商人在經營上得到較多的優勢（如產業的保護、資金的融通等）。不過，物換星移，原來在1950年代各行各業到處可見具代表性的上海工商業者，部分或因經營不善，或因與臺灣本土企業交互投資而無形消失，1970年代，第一代上海人來臺設立的企業在臺灣代表性的大型企業中剩下不及四分之一，1990年代開放大陸投資前夕，臺灣一

百大企業中與上海商人密切相關者約剩十分之一。

雖然如此，同時經營傳統與現代科技產業的上海遷臺商幫遠東集團、裕隆集團、華新麗華集團等，仍是臺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產業，他們返回大陸投資也有幾點值得注意：一、遠東與華新麗華的投資重心是環繞上海（長江三角洲）而展開，具有落葉歸根的意味，也因為其產品性質多屬內需產業，華中地區的交通運輸條件及廣大市場也是重要考慮；裕隆選擇福建與廣東為投資重心，考慮的是產業競爭的市場區隔（上海已有強勢的國營汽車工業集團），不過其產品市場仍是面向全中國；二、雖然1996年之後政府當局對臺商前往大陸投資採取限制、不鼓勵的政策（幾乎可以說是五十多年前新中國成立初期指責「遷廠逃資」的翻版），但是臺商並未因此放慢投資的腳步，上海商幫也不例外，2000年之後的投資規模反而更加擴大；三、1949年許多上海商人離開中國，是基於脫困的動機，相同的，臺商在五十年後被大陸市場吸引，也是為了避免困守臺灣一隅，尤其全球化高度競爭的時代來臨，臺灣與中國大陸又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企業經營的策略與佈局，工商業者必然會從商業與經濟的角度作決策。

政治力量從來都想以「政治正確」來主導經濟的走向，然而歷史前進的方向卻常常與當政者主觀意識的期待南轅北轍，歷史經驗的延續、斷裂與峰迴路轉，真令人難以逆料。1949年前後「遷廠逃資」的滬商經歷已提供充分的教訓，近十餘年間所有臺商不顧政府部門的各種政策限制與道德勸說，仍前仆後繼前往大陸投資，其中的因由必有值得深入玩味者。歷史或將再度弔詭的證明，臺灣經濟未來的前途，將等待這些在海外（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發展茁壯的臺商企業回饋本土。

定稿日期：2008.3.24

引用書目

- 〈美援運用委員會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經濟部商業司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天下雜誌》一千大調查，2005年、2006年、2007年版。
- 《聯合報》，1956年10月25日。
- 上海集團處方藥事業部網站，<http://www.sinepharm.com>。
-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年報，2005年版，http://www.cec.tw/web/about/milestones_c.php。
- 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89年度年報〉，<http://doc.tse.com.tw/server-java/t57sb01>。
- 中時電子報，2007年11月19日，<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611190121+96111904+0+102146+0,00.html>。
-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統計資料，<http://moeaic.gov.tw/>。
- 裕隆企業集團網站，<http://www.yulongroup.com.tw>。
- 臺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年報〉，<http://newmops.tse.com.tw>。
- 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tse.com.tw/ch/listed/listed_company/apply_listing.php。
- 遠東集團網站，<http://www.fetl.com.tw>。
-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
- 1980 《榮家企業史料》，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0 《大陸機器廠的產生、發展和改造》（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1 《劉鴻生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1 《劉鴻生企業史料》，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工商時報（編）
- 2005 《大陸臺商 1000 大》，2005年版。臺北：商訊文化事業公司。
- 2006 《大陸臺商 1000 大》，2005-2006年版。臺北：商訊文化事業公司。
- 2007 《大陸臺商 1000 大》，2007年版。臺北：商訊文化事業公司。
- 天下雜誌社（編）
- 2007 〈2007年一千大調查〉，《天下雜誌》371: 163-207。
- 中西藥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
- 1990 《中西藥廠百年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編）
- 1990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國名人傳記中心（編）
- 1982 《中華民國現代名人錄》。臺北：中國名人傳記中心編印。
-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
- 1955 《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 1963 《中華民國工商人物志》。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 1974 《工商協進二十年》。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 中華徵信所
- 1970 《臺灣區 59 年度壹佰家最大民營企業》。臺北：中華徵信所。
- 1971 《臺灣區企業集團彙編》，1971年版。臺北：中華徵信所。
- 1972 《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1972年版。臺北：中華徵信所。
- 1982 《塑膠工業》。臺北：中華徵信所。

- 1983 《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1982/1983年版。臺北：中華徵信所。
- 1991 《中華民國大型企業排名》。臺北：中華徵信所。
- 1999 《臺灣地區汽車產業傳》。臺北：中華徵信所。
- 2005 《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6年版。臺北：中華徵信所。
- 2007 《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8年電子版。臺北：中華徵信所。
- 2007 《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8年版。臺北：中華徵信所。
- 王克敬
- 1988 《臺灣民間產業40年》(第2版)。臺北：自立晚報。
- 朱沛蓮(編)
- 1992 《東雲章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吳銘琛
- 1961 《臺灣棉紡織工業概況》。臺北：臺灣銀行。
- 呂青原
- 1986 〈王永慶、趙廷箴合力開創臺灣石化王國〉，《財訊》49: 43。
- 宋路霞
- 2005 《上海灘豪門望族》。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
- 巫仁恕、孫可立(訪問)，王景玲(紀錄)
- 2000 〈章民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呂芳上等訪問、謝采秀等紀錄，《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頁273-28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李海清
- 2004 《中國建築現代轉型》。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 李益銘
- 1958 〈臺灣之肥皂工業〉，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工業論集》，卷二，頁163。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李乾朗
- 2001 《20世紀臺灣建築》。臺北：玉山社。
- 李鴻儒(主編)
- 1985 《江蘇旅臺人士史料彙編》。臺北：復興書局。
- 周正賢
- 1996 《施振榮的電腦傳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林邦充
- 1969 〈臺灣棉紡織工業發展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20(2): 79。
- 金普森、孫魯根(主編)
- 2001 《寧波幫大辭典》。寧波：寧波出版社。
- 芮廷玉
- 1981 〈石鳳翔與西北紡織業〉，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工商史料》2，頁7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 徐有庠
- 1994 《走過八十歲月》。臺北：徐旭東出版發行。
- 海外出版社(編)
- 1958 《僑資工廠在自由中國》。臺北：海外出版社。
- 國史館(編)
- 1988 〈王新衡先生事略〉，收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輯，頁80-81。臺北：國史館。

- 1994 〈陶桂林先生年表〉，收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2輯，頁383-386。臺北：國史館。
- 1998 〈周文璣女士事略〉，收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8輯，頁93。臺北：國史館。
- 2000 〈應昌期先生事略〉，收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23輯，頁698-700。臺北：國史館。

張敏鈺

- 1992 《平凡中創新機》。臺北：卓越出版社。

許維雍、黃漢民

- 1985 《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陳良榕

- 2006 〈飛羚經驗 大陸開花〉，《天下雜誌》347: 208-212。

陳清宇、赫景秀

- 1994 〈中華火柴大王劉鴻生〉，收於趙云聲主編，《中國大資本家傳》5，工商大王卷，頁180-182。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陳逸平（總編輯）

- 2005 《上海銀行九十年》。臺北：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曾勇義

- 1969 〈臺灣之汽車工業〉，《臺灣經濟金融月刊》5(10): 20。

馮邦彥

- 2002 《香港華資財團》。香港：三聯書店。

黃東之

- 1956 《臺灣之紡織工業》。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1958 〈臺灣之毛紡織工業〉，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工業論集》，卷二，頁123-12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溫曼英

- 1993 《吳舜文傳》。臺北：天下文化。

葛中平、董寧祥（主編）

- 1990 《上海新光內衣染織廠五十五年》。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廖慶洲

- 1987 《當代企業家成功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榮敬本等（編）

- 1995 《深談榮氏家族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熊鈍生（主編）

- 1978 《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第三冊。臺北：中華書局。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編）

- 1952 《臺灣的民營工業》。臺北：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 1952 《臺灣省民營工廠名冊》，上冊。臺北：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 1953 《臺灣省民營工廠名冊》，下冊。臺北：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遠東紡織關係企業遷臺30週年紀念特刊編印小組（編）

- 1979 《遠東紡織關係企業遷臺30週年紀念》。臺北：遠東紡織關係企業遷臺30週年紀念特刊編印小組。

劉念智

- 1982 《實業家劉鴻生傳略》。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謝國興

〈在社會主義改造的盡頭折返：定息問題及其餘波〉。未刊稿。

魏岳壽

1958 〈臺灣之調味粉工業〉，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工業論集》，卷一，頁45。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嚴演存

1991 《早年之臺灣》（第2版）。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Wong, Siu-lum 黃紹倫

1988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 in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ugitive” Businessmen from Shanghai around 1949

Kuo-hsing Hsieh

ABSTRACT

Uncertainty and fear of Communist rule had driven many businessmen from Shanghai to shift to Hong Kong and Taiwan. Along with them came their capital, technology, equipment, human resources and modern conc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In the eyes of the Communists, these Shanghai businessmen were like fugitives, running away with both money and facilities; while to the Taiwanese, they were contributors to the prosper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Their influence and status in both commerce and industry, though diminished with the lapse of time, remain strong.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allowing Taiwanese businessmen to invest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1990s, these businessmen originally from Shanghai became Taiwanese investors in the Mainland. Nevertheless, rather than adopting an encouraging attitud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posed barriers for investment in the Mainland due to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reasons. Despite so, businessmen from Taiwan, both native and of Shanghai origin, kept increasing their investment in their Mainland out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 and for sustainability of their business. The move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toward Mainland China mirrored the shift of their Shanghai counterparts to Taiwan around 1949—an irony in history.

Keywords: Shanghai businessmen, investing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ese businessmen